


[\[科研成果首页\]](#) - [\[所有科研成果\]](#)

[项目类型] 专职人员科研成果
 [成果题目] 中国东北三省产业结构主要问题与对策
 [作者姓名] 赵儒煜
 [成果类型] 专著
 [出版单位] 东北亚国际会议论文集 2000.8
 [出版时间] 2000年08月

[成果全文]

50年代以来,东北三省一直作为我国的重化工业基地和农业基地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东北三省产业结构转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这种转换的步伐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经济增长却显得相对缓慢。从经济增长率指标来看,东北地区很少有全国名列前茅之时,1998年辽、吉、黑三省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9%、9.0%、8.0%,属全国中下游。

综观东北三省产业现状,技术水平落后、产品结构老化、环境保护不够、国际竞争力差等问题仍很深刻。特别是在国内市场疲软,区外竞争激化,国际上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加入WTO近在眉睫的形势下,上述产业问题令人尤感严峻。

一、东北三省产业结构的演变

(一)辽宁省产业结构特征分析

近20年来,辽宁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其工业强省地位已是其实难副。

改革开放后,与全国工业部门比重普遍上升的趋势相反,辽宁省工业部门比重一路下滑,并在1996年开始低于全国水平。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辽宁省工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1991—1998)为5.4%,远远低于全国(1991-1998)14.8%的增长速度。

首先,辽宁省产业结构的根本特征是工业为主,而且是重工业,是以原材料、资源加工部门为主的重要设备投资的供给源,发展速度相形见绌。

同时,辽宁省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内部结构也较为落后,削弱了其牵引经济发展的作用。在轻工业中,可与重工业相循环的占1/3弱,而其中还有引进外部资源的成分。在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也使得重工业中直接与消费接口的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巨大限制。

表1 辽宁省产业结构变迁(单位:%)

年代	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GNP增长率
1978	14.1	71.1	14.8	22.5
1980	16.4	68.4	15.2	7.6
1985	14.4	63.3	22.3	12.4
1990	15.9	50.9	35.2	0.1
1994	13.0	51.7	35.9	11.2
1998	13.7	47.8	38.5	7.9

资料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

注:1952年度增长率为1953年度值。

年代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8
轻工业	26.7	32.4	31.6	32.2	27.0	23.9
重工业	73.3	67.7	68.4	67.8	70.0	76.1

资料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1999)。

其次，农业的比重仍然很大，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工业不尽景气的情况下，时有农业牵引经济发展之需。1990年辽宁省GDP增长0.9%，当时工业部门为负增长(-3%)，服务部门增长4.8%，农业部门则增长14.5%。近年来，这种倾向更加明显，1996年GDP增长8.6%，当时，农、工、服三部门分别增长12.6%、7.8%、8.4%；1998年GDP增长8.3%，其时农、工服三部门分别增长13.0%、7.6%、7.9%。反之，1997年，工业部门增长10.5%，服务部门增长9.2%，GDP仅增长8.9%，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农业遭遇自然灾害，仅增1.3%。以上情况说明，辽宁省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作用还很大，但其技术含量还很低，“靠天吃饭”现象较为严重，从而再次反衬出当前重工业基下，城市化也得到很快发展，工业部门、服务部门的比重迅速上升，农业部门比重逐步下降，产业间比例有趋于合理的倾向。但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趋势发生了变化。工业部门受到冲击，服务部门受到的打击则更大。但由于当时粮食生产技术落后，农民积极性不高，使得具有农业生产天然条件优势的吉林省在全国占据着战备粮仓的重要地位。因此，吉林省农业比重并未大幅下滑，基本保持平稳，而服务业比重有所下降，工业比重则被抬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农业部门首先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吉林省作为全国农业基地之一，农业部门本来比重就很大。在这一改革政策的积极推进下，吉林省农业发展更快。同时，服务部门不断恢复、发展起来。加上近年来注重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1988年服务部门产值为102.51亿元，首次超过了农业的92.59亿元。相比之下，工业部门在改革中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一方面，国家政策是首先开放东南沿海地区，使得吉林省这样的边疆内陆省份在吸引外资、内资和政策支持方面都无法与沿海诸省相争；另一方面，吉林省和辽、黑两省一样，国有大中型企业较多，而国有企业改革每每“山雨欲来”，但往往由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因素太多而止于“风满楼”而已。因此，工业部门在技术老化的困扰下，出现了生产效益低、职工下岗较多、再就业压力巨大等问题，地位逐步下降。

90年代以来，吉林省的产业结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大省特色未改。农业部门比重有所下降，但仍非常稳定。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农业部门的作用则较为明显。1990年工业、服务业增长率分别为2.1%、9.3%，而吉林省的GDP增长速度达3.4%，其中农业部门36.7%的高增长，可谓功不可没。1996年、1998年都出现了工业、服务业增长率低于全省GDP增长率的情况，均以农业部门较高的增长率实现全省增长率的提高。

但这并不说明吉林省农业部门已非常先进。1997年吉林省遭遇特大旱灾、风灾，农业出现-0.4%的负增长，说明了其仍在“靠天吃饭”之境。1998年农业的大幅增长，包含着对上一年度的反弹成分。同时，也从反面说明了工业部门、服务部门发展的相对迟缓和艰难处境。

2. 重化工业基地包袱沉重。改革开放之初，吉林省轻工业摆脱了制度上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束缚有所发展，在90年代之后受到沿海地区激烈竞争的冲击，使得本不景气的重化工业在技术进步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再次在工业内部结构中呈现增长势头

(参见表4)。

表3 吉林省产业结构变迁(单位：%)

年代	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GNP增长率
1978	29.3	52.4	18.3	12.8
1980	27.6	53.0	19.4	6.5
1985	27.8	48.5	23.7	6.8
1990	29.4	42.8	27.8	3.4
1994	27.7	42.6	29.7	14.3
1998	27.6	38.3	34.1	9.0

资料来源9：《吉林省统计年鉴》。

轻工业在90年代的下落，表面上与国际公认的由轻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的工业内部发展规律是并不矛盾的。但客观上，这种产业发展的递进必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在吉林省，技术进步除汽车行业较为显著外，其余并不明显。而且，由于汽车产量、价格等方面的因素，一汽集团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再从轻重工业的内部结构来看，既有合理性的表象，也有明显的落后之处。轻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小，使得重工业的支持作用也受到了制约。重工业中制造业比重一直占绝对优势，这一点与辽、黑二省有所不同。而且，进入80年代以来，制造业比重基本处于上升状态，1997年达59.0%。当然，从理论上讲，这一特征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但从具体背景上看，制造工业的比重增大，是由于原料、采掘工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而且，在GDP增长上并未表现出加速推动的作用。

表4 吉林省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单位：%)

年代	轻工业		重工业		轻工业	重工业	轻工业	重工业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采掘工业	原料工业				
1978	39.8	63.6	36.4	60.2	13.9	28.1	58.0	

1980	39.9	69.7	30.3	60.1	12.6	34.8	X.6
1985	40.8	72.6	27.4	59.2	12.2	34.9	52.9
1990	44.6	71.3	28.7	55.4	11.4	33.4	55.2
1995	35.5	75.8	24.2	64.5	10.6	31.3	58.1
1997	32.2	74.4	25.6	67.8	10.2	30.8	59.0

资料来源：《吉林省统计年鉴1998》。

3. 服务部门发展迅速。在此，资金投入较多是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如1998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40亿元，为前4年的总和；交通投资63.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7%；邮电通信投资6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38%。相比之下，水利建设投入22亿元，已是上一年的3倍。

(三)黑龙江省产业结构特征分析。

黑龙江省是我国第二大商品粮基地和原油、煤炭、木材等重要工业原料以及工业装备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之后到90年代以前，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并不平静。进入90年代之后，黑龙江省产业结构的演变表现出一些新的基本特征：

1. 农业部门比重呈现出波动中逐步下落的趋势，“靠天吃饭”现象明显。同时，林业部门应环境保护的需要近年来也在逐步缩小，这个矛盾的解决需依靠粮食、畜牧、水产、经济作物等的发展来弥补。
2. 工业部门保持较高增长，但基础工业基地特征未改。进入90年代，黑龙江省的工业保持平稳增长，基本上发挥了牵引经济发展的作用。只有1990年，工业部门、服务部门负增长，由农业部门41.8%的高增长牵引经济整体上升5.8%。其余年份工业一直以高于整体增长率的速度增长。但是，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这种增长并不乐观(参见表6)。

黑龙江省的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仍然是重多轻少，差距较大。在数字统计上看，似非坏事。但问题在于，这种重工业主导的工业在中国现阶段由于技术落后和其内部结构不合理而使之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难题之一。就黑龙江省而言，重工业内部结构尤为不利。1985年，黑龙江省加工工业比重尚在34.4%，1997年已降至25.4%。这说明，黑龙江省的重工业主要是靠卖资料、原材料生存的。这种倾向，在即将蓬勃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能源、新材料和人类社会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增长追求的冲击之下，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再从轻工业内部结构来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保持在80%左右，居高不下。相比之下，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则显得较为单薄。

表5 黑龙江省产qI,ggJ变迁(单位：%)

年代	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GNP增长率
1978	23.5	61.0	15.5	11.1
1980	25.0	59.3	15.7	10.0
1985	21.7	57.8	20.5	6.0
1990	X.4	50.7	26.9	5.8
1994	19.5	52.7	27.8	8.7
1998	16.3	53.2	32.0	8.0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注：按可比价格计算。

表6 黑龙江省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单位：%)

年代	轻工业		重工业				
	以农产品为原料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采掘工业	原料工业	制造业	其他	
1985	33.5	80.2	19.8	66.5	38.2	27.0	34.8
1990	33.6	79.1	20.9	66.4	45.9	27.2	26.9
1995	32.0	75.0	25.0	68.0	44.4	30.2	25.4
1997	34.9	79.4	20.6	6.1	45.6	29.0	25.4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统计年鉴1998》。

3. 服务部门在投资的拉动下保持快速增长，带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和临时性。1998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801.6亿元，其中农业部门12.8亿元，增长40.7%；通储及邮电业176.7亿元，增长41.1%。1999年固定

资产投资808亿元，其中农业部门占2.4%，运输邮电投资占14.5%。

(四)东北经济区产业结构总体特征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工业部门占中心地位，但有下降趋势；农业部门比重虽在下降但仍占较大比重；服务部门比重不断提高。在工业部门内部，重工业占绝对优势，其中采掘、原料工业比重较大，制造业相对薄弱；轻工业比重较小，且主要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部门。从产业结构整体发展趋势看，尽管90年代以来基本态势为稳定，但工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未发挥出来，处于慢性萧条之中。因此，东北地区可以说产业结构调整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今后可谓任重道远。

二、东北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一)国际形势充满机遇和挑战

1. 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

第四次科技革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在整个体系上改变现有的工业部门。因此，已落伍于现在的东北地区工业体系，不能存幻想于以原有技术体系基础上的技术改造求新生，而必须抓住机会，首先从主要部门人手，脱胎换骨，才能摆脱爬行状态，不致落后于时代。

2. 加入WTO迫在眉睫

“人世”是中国政府推进改革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意义深远，勿庸赘言。而从短期来看，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对于东北三省而言，不仅有农业、汽车业首当其冲将受到冲击，其他产业部门也必将受到竞争的威胁。但这也是好事，使我们猛醒过来，变压力为动力，未雨绸缪，抢占先机，加速技术改革和制度变革的进程，才能有备无患。

3.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充满机遇

在面临国际竞争压力的同时，东北地区也存在着国际合作的有利条件，特别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近年来已从学术探讨步入实际操作及合作阶段，给东北经济的今后发展带来机遇和支持。

(二)国内环境不乏压力和动力

1. 农业结构改革即将推行

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当前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重要任务，要积极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畜牧业、林业和水产业，发展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深加工，等等。

2. 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00年要围绕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着重抓好四个环节：一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限制没有市场销路的产品生产。二是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并向老工业基地倾斜。三是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特别是发展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等产业。同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继续推进行业改组，促进重点行业提高规模效益，优化布局。要努力提高重大装备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

3. 西部大开发战略即将实施

西部开发是我国政府为解决地区间严重不平衡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对于东北地区有着深远意义。东北地区既有属于东部地区的辽宁，也有属中部地区的吉、黑两省，大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参入西部开发之中，由此推动自身的技术革新、结构调整。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同时，为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支持作用和产业传递中介作用，国家已提出要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债投资、“债转股”、核销呆坏准备金和外国政府及金融机构贷款，也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因此，可以说，西部大开发，对于“一东二中”的东北三省而言，也为千载难逢的良机。

(三)东北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

1. 自然资源的优势与劣势

东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但近年来，也出现了资源相对不足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工业资源长期采取之余，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方面，东北工业体系以重化工业为主，重工业中又以原料、采掘业为主，由于工业技术的落后，采取过程中的资源流失、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加剧了工业资源的相对不足倾向。

而从未来发展角度看，东北地区资源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课题。其一，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煤炭、石油等带来较多环境问题的资源的使用必将日益减少，必将给现在的能源结构带来冲击。其二，东北现有产业资源与未来产业之间也未尽相适，勘探新资源、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也是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与其固守天赐资源，不如大力抓好人力资源，这才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2. 劳动力资源

东北地区是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而且由于工业化进程开展较早，社会文化素质也相对较高，具有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但是，随着国企改革的进展，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东北地区，下岗职工必将逐步增多，也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首先，在产业结构方面，出现了工业部门、服务部门缩小，劳动力向农业部门转移的倾向。其次，下岗人员数量巨大，尽管有利于企业控制成本，但由于工资可比价格刚性的存在，劳动力成本下降的余地并不大。相反，再就业问题突出，社会保障问题也成为当务之急，使我们在亟待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际，也不得不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3. 技术资源

从开放的角度来看，每一经济区的技术资源都可放在全国、全世界的范围里，在能够取得技术的前提下加以考虑。在此，东北地区的技术资源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加以探讨。

(1)现有技术基础

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多数设备超期服役，工艺落后，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企业在低水平上分散，技术在低水平上重复，产量在低水平上扩大。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小，基本上不超过5%，影响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移能省份，靠拼资金、拼资源换取经济低效增长方式至今仍未得到实质改变。

(2)当前的技术资源

第一，就国内技术资源而言，还是较为可观的。一方面，国内沿海一些地区的新兴产业、企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开发能力，并有接近国际水平的新产品相继问世，如电动汽车技术、液晶电视技术等，在国际上虽不是领先的，但还是同一时代的。另一方面，国内的技术转让远比国际的技术引进成本小，而且便于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故易成功。

第二，就国际技术资源而言，并不乐观。(1)国际先进技术很难引进，往往花大价钱，买来人家精心挑选的1日技术，甚至旧设备。(2)目前正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形成期，而非成熟期，甚至也不是发展期，

国外先进技术也尚未完全成熟，很可能买时是新的，到手就是旧的。(3)技术引进往往与引进外资相辅同行，东北地区既无东南沿海的地缘优势和产业基础；也无西部的资源优势和政策扶植，很难竞争过国内其他区域。因此，归根结底不能在引进一条路上走，何况这是一条永远落后的道路。

第三，从最根本的技术开发能力来看；东北地区尚须努力。从90年代有关统计来看，科技机构数、科研人员数均有下降倾向，科研经费总额虽有上升，但幅度不大。在此，大企业对技术开发的降温令人担忧。而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众多大专院校的科研开发潜力也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所有这些，都是今后发展必正视并加以克服的课题。

总之，就内部资源而言，东北三省虽有较早开展工业化的积累，但历史包袱多于现有的活力；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但科技创新能力尚未发挥出来(或者说尚未形成)；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厚于农而薄于工，特别是在面向未来之际，工业部门的变革更是迫在眉睫。

三、东北地区发展战略

(一)总体战略

综上所述，东北经济区近年来的发展缓慢、效益低下现象从表面上看似结构问题，而本质原因是技术落后，而造成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则有政策倾向、制度残留包袱等问题。当前，主要矛盾已集中在技术落后之上，而技术的载体是产业，因此，总体战略的核心也应该是产业发展的技术改造、创新问题。

1. 改革开放是基本前提
2. 以新兴产业为方向，高科技产业先行
3. 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扶植新兴产业相结合
4. 农村产业化势在必行

(二)具体措施建议

1. 官产学紧密结合推进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

2. 从根本出发，建设“产业孵化器”；推进新兴产业的创业与发展“产业孵化器”不单是一个支持风险投资的机制问题，而应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高新技术孵化器；其二，创业者孵化器；其三，组建支持风险投资的风险财团。

3. 统筹全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行，以产业循环为依据，逐次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一，以少数高新产业为突破口，选择产业基础较好、技术相对成熟、国内外市场潜力大、附加价值高者，倾全力开发、创业。在此，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等产业为务之急，已成共识。但就东北三省而言，电动汽车、液晶家电、电脑硬件开发生产、垃圾处理、太阳能电池技术与太阳能发电等产业似应优先选择。

第二，根据新兴产业的产业循环需要建置配套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东北地区传统产业包袱较多，行业分布广，而资金总量有限，既不可能全面改造，也不可能统一划齐。因此，必须加以选择，应集中有限资源与资金，首先使新兴产业站稳脚跟，形成良性循环。而后，依托新兴产业逐步在生产协作中改造传统产业。

第三，农业产品结构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西部大开发的进展，农产品结构调整机会也到来了。一方面还林还草；另一方面，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并力求通过出口、精加工来提高其附加价值。此外，城市中的传统产业可通过向农村转移来找寻出路，这样既可减少传统产业改造压力，也可推进乡镇企业发展，实现“雁行模式”的区域化。在此，为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尚须加强信息传递、政策诱导等工作。

4. 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

利用东北亚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有利条件，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解决经济总量不足和产业技术落后等问题。同时，加强国内区际经济合作，特别是要积极参入西部大开发中，抓住商机，努力开拓，在与全国、全世界企业的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推动经济更加健康、合理、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区域投资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投资的快速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在中国投资增长的过程中，投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差异越来越大，区域投资差异对人口迁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80年代中后期中国区域投资分布

如果在短时期内把技术进步视为相对不变的量，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大，尤其是对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性因素。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投资的拉动。

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政策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转变，并且，改革开放首先由东部沿海地区开始，逐步向内地推进，因而，中国区域投资向东部(1)省份集中，东部人均投资拥有量不断上升，中西部人均投资拥有量与东部的差距逐渐加大，区域投资差异扩大。

表1为1981-1985年(“六五”期间)和1986-1990年(“七五”期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排序。从总的趋势上看，东部省份的人均投资排位都是上升的。除了河北省始终排在第17位没有变化，其余省份的排位均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浙江、山东、江苏上升的幅度都比较大，分别由“六五”期间的第X位、第20位和第18位，上升到“七五”间的第8位、第12位和第7位。西部9省人均投资的排序排位均全面下降，而中部省份人均投资的排位，有生有降，总体上是下降的趋势。

表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排序

单位：元/人

	1981~1985年	1986—1990年	1981-1985年	1986—1990年
1	上海(581)	上海(1664)	16	湖北(88)
2	北京(500)	北京(1461)	17	河北(86)
3	天津(461)	天津(979)	18	江苏(83)
4	青海(252)	辽宁(616)	19	福建(80)
5	新疆(205)	广东(570)	20	山东(78)
6	黑龙江(197)	青海(504)	21	云南(77)
7	辽宁(191)	江苏(500)	X	浙江(70)
8	西藏(165)	浙江(497)	23	四川(63)
9	宁夏(157)	新疆(481)	24	河南(56)
10	山西(150)	黑龙江(434)	25	江西(56)
11	广东(130)	宁夏(411)	26	安徽(54)

12	内蒙(124)	山东(387)	27	湖南(53)	云南(195)
13	吉林(116)	山西(386)	28	贵州(52)	江西(185)
14	陕西(110)	海南(376)	29	广西(51)	广西(164)
15	甘肃(92)	吉林(434)	30	贵州(128)	

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②1981-1985年不包括海南省；③投资按实际金额计算。

80年代中期以来，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投资差异也呈现扩大趋势。东部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的较快(见表

2)，东部人均投资与中西部的差距在加大，而中西部人均投资的

差距略有缩小。从“六五”期间的52.1%，上升到“七五”期间的58.6%；而中部和西部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都处于下降的趋势，与“六五”期间比，“七五”期间，中部和西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下降了4.4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东部投资分别是中部和西部投资的2.2倍和4.0倍。“六五”期间，东部、中部、西部人均投资的比为2.19:1.15:1，“七五”期间上升到5.56:1.09:1。外资分布差异更大，“七五”期间，东部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达到89.6%，中部和西部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分别只有5.7%和

4.7%，东部是中部、西部的15.7倍和19倍。

表2 区域投资构成和区域人均投资额

区域投资构成(%)		区域人均投资额(元/人)	
1981~1985	1986-1990	1981~1985	1986~1990
东部 52.1	58.6	151	495
中部 31.0	26.6	103	260
西部 16.9	14.8	88	226

资料来源：同表1。各省人均投资见附表2。

综上所述，8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投资差异逐渐扩大，区域外资分布的不平衡程度更高，投资梯度已经形成。形成区域投资差异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既包括区域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也包括人文优势。沿海地区由于拥有直接的进出口通道，相对内地较少的进出口运费，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理优势；人文优势包括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比如中国的广东、福建等省，由于与港澳台地区毗邻，文化、语言相通，并且拥有大量侨眷，成为吸引港澳台华人投资极为有利的因素。

(二)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指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财政、税收、金融、投资政策。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以政治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持下，国家经济管理目标能够自上而下顺利地贯彻执行。国家以均衡发展为目标，通过直接控制投资、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调节区域经济。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处于过渡型混合经济时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东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开放的前沿，国家给予东部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政策优惠，在金融、财政、税收、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及基础设施建等方面向东部倾斜，东部投资总量增长速度较快。其中，福建、广东、海南吸引外资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享受十分优惠的特区政策(鲁明泓，1997年)。

(三)地方政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央集权制逐渐向中央和地方分权制过渡。中央权力逐渐下放，改“统收统支”为“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地方政府从过去的政策执行机构，演变为集责、权、利于一身的综合行政管理机构，地方利益得到强化，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政绩直接相关。实行分权和地方利益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在市场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市场机制更大、更明显，在区域发展过程中扮演主角。各级政府为了增加地方投资，吸引其他地区的投资和外资，纷纷向国家要优惠政策，并在自己的事权范围内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这种现象曾一度使金融秩序相当混乱。

二、区域投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有关学者的研究说明：建国初期(1952-1965年)，在人口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同时，大量人口沿着历史上传统的迁移路线从东中部迁往东北和西北。根据杨彦彦和陈金永(1993年)对1964-1982年中国人口迁移方向的研究结果推算，1966-1978年间人口迁移的方向是由东部向西部迁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方向发生了逆转，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迁移，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向东部迁移的趋势更明显，集中迁入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山东等最发达地区。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局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投资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固定资产投资与省际迁移的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决定于城市与农村预期收入的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在托达罗的迁移模型中收入和失业率都被作为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并纳入到迁移模型之中，而其他影响迁移的因素被忽略了。失业率与投资具有直接的联系，某一地区投资的增加或减少决定了该地区就业机会的增减，就业机会的变化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而影响到人口迁移，特别是劳动力迁移。但是，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在应用于我国人口迁移研究的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題。一些学者应用(王桂新，1997年)托达罗的模型研究我国省际迁移，所得到的结论与模型本身自相矛盾，从数学意义上否定了该模型。

产生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人口迁移具有特殊性。首先，我国属于控制迁移的国家，自由迁移的前提假设在我国并不适用。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性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可能超过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其次，我国失业统计不够真实，和非正式就业的大量存在。我国普遍存在劳动力人口过剩，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更加严重，而我国失业率统计偏差较大另外，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存在大量在非正式部门

的就业，这部分就业统计更加困难。因此，在研究区域投资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时，我们直接考察人均投资与迁移率的关系，分析各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省际间迁出率、迁入率和净迁移率的线性相关关系(见表3)各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迁入率为高度线性相关，在假设排除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各省人均投资能够解释迁入率的84.4%，单侧检验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其线性相关系数为0.921，说明各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多少对人口迁入有显著的影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越高，对迁入的拉力

越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净迁移率的线性相关性比前者还高，在同等条件下，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能够解释净迁移率的85.6%，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25，说明各省人均拥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净迁移率的影响更加明显；而迁出率与人均投资额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只有0.365，说明人均投资额对各省人口迁出的影响不大。

表3 1985-1990年各省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省际迁移率的相关分析

	线性相关系数 (Pearson)	判别系数 R	自由度 df	F	单侧检验
				显著性水平	
迁出率	0.365	0.133	28	0.106	0.425
迁入率	0.925	0.848	28	151.16	0.001
净迁移率	0.825	0.856	28	160.26	0.001

资料来源：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1986-1990年的平均值。

(二) 外资对迁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急剧增加，从改革之初1984年的12.58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37.55亿美元，到1996年达到417.26亿美元。外资的直接投入对中国区域投资格局和区域发展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各地区开放时间、区域发展政策的差异和区位优势的不同，使外资在中国的分布极其不平衡。

1986—1990年外国投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比重占89.6%；中部和西部吸收外资的比重分别为5.7%和4.7%。外资分布的不平衡是形成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外资投入量的逐渐加大，外资对区域发展和区域迁移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

表4为1985-1990年各省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与省际迁移率的相关分析。与表3同样，各省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与迁入率没有线性相关关系，与迁入率和净迁移率具有强相关关系，而且，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与净迁移的线性相关性更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净迁移率的79%可以用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来解释，迁入率的解释率为69.1%，既迁入率和净迁移率的9.1%和79.1%是受人均利用外资影响所产生的。

表4 1985-1990年省际迁移率与各省人均投资的线性相关分析

资料来源：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为1986—1990年的平均值，来源于1986

—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

	相关系数 (Pearson)	判别系数 R ²	自由度 df	F检验	显著性水平
迁出率	0.143	0.02	28	0.560	0.461
迁入率	0.836	0.691	28	62.721	0.001
净迁移率	0.894	0.791	28	107.264	0.001

表3与表4中，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与迁入率、净迁移率的线性相关程度不同。人均利用外资与迁入率、迁移率的相关程度低，是由于外资分布比固定资产投资分布的不平衡程度更大，从而降低了线性相关性。

投资不仅直接影响迁移，还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的各个变量对人口分布产生影响。投资差异使东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收入水平提高，区域收入差异扩大，特别是城市经济差异扩大，使东部省份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和管理方式与内地相比有了较大提高，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差距越来越大。在这一过程中，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对人口迁入的拉力增强，中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对人口迁出的推力也在加强。

三、讨论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投资分布的差异越来越大。投资差异使东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劳动力需求等与内地相比有了较大提高，对人口迁移特别是劳动力迁移形成了巨大的迁出拉力。

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人口迁移能够发挥平衡区域差异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人口迁移受到限制。自1958年，中国国民被划分为两种“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二元社会结构是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时也使城市间的迁移受到抑制。伴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维持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有所松动。1984年国家出台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在一些大城市给一部分迁人口办理“蓝印户口”，保证在城市就业、工作的移民享受城市人口同样的福利；农转非的比重加大；粮食和副食供应制度取消等等。这些改革措施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

投资劳动人口迁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力区域分布，特别是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农村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地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中西部农业省份，劳动力转移压力越来越大。1984年我国有农村剩余劳动力9485万，1994年超过2亿。而东部投资增加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特别是外资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促进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交流，人口跨地区、长距离迁移不断增加，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得以缓解。区域投资差异拉动了人口迁移，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人力资源的分布。一方面，在人口迁移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文化素质越高的人，流动性越大，实现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各地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迁入，并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低素质劳动力迁入，减轻本地区就业压力，对迁移人口进行选择。上述原因导致人力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使人口素质高的地区更高，低的地区更低。

有关学者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85—1990年间，我国省际移民文化程度差异很大，原来文化水平越高的省份，迁入人口文化程度越高；反之，文化水平越低的省份，迁入人口的文化程度越低(张善余等，1995年)。另一项研究表明：1985—1990年

间，我国省际迁移是由中西部向东部迁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具有更明显的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并且集中在东部最发达的几个地区(范力达，1992年)。

注释：

①东部为沿海12个省、区、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西部九省包括：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云南、西藏、陕西。中部九省包括：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参考文献：

- [1]范力达：“中国80年代末期区域间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人口学刊》，1992年第5期。
- [2]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 [3]魏后凯：“论中国区际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
- [4]杨云彦、陈金永：“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的资料与测定”，《中国人口科学》，1993年第2期。
- [5]马侠：“中国人口迁移模式及其转变”，《中国人口科学》，1990年第3期。
- [6]张善余、丁宝树等：“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迁移数据分析”，《1990年人口普查时局专题分析论文集》下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 [7]穆光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和趋势”，《人口学刊》，1994年第3期。
- [8]王放：“论中国近期省际人口迁移的形势”，《人口学刊》，1993年第3期。
- [9]范力达：“人口迁移的均衡模型与非均衡模型评述”，《中国人口科学》，1994年第5期。
- [10]朱家良、吴敏：“中国不同区域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特性及趋势”，《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6期。
- [11]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12]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我国投资环境评估”，《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您是第1191085位访问者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林园路1788号

邮编：130012

电话：86-431-5166393

传真：86-431-5166396

E-mail: yuxiaojiao@mail.jlu.edu.cn